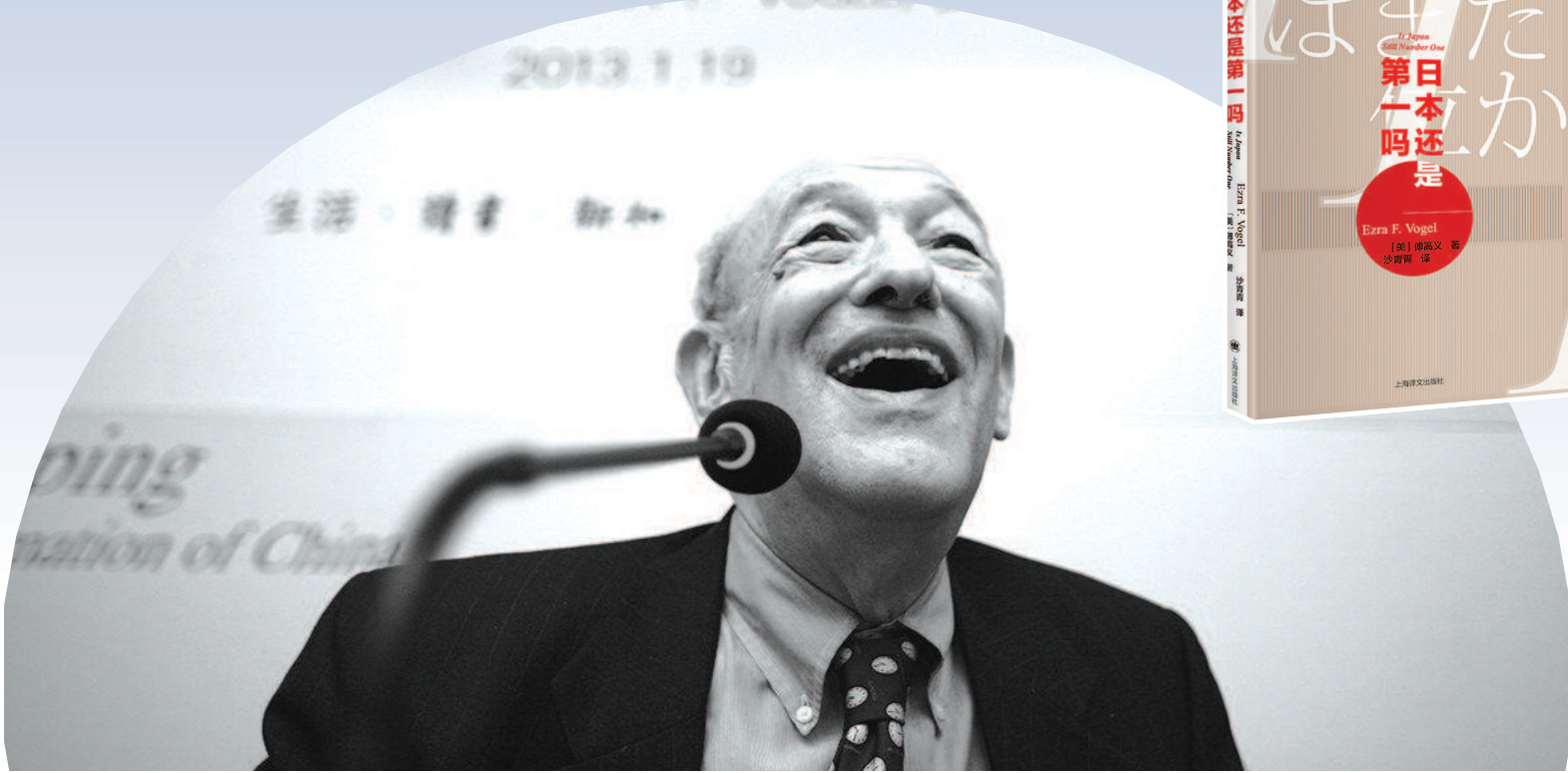


大多数中国人知晓傅高义，始于2013年他的《邓小平时代》席卷大江南北。百万册级别的发行量，令他从学术界迅速跃入中国公众的视野。而早在1979年，《日本第一》由美国至日本横扫书肆（1979年日本人口总数才1.1587亿，行销70万册，是他所有著述中，在日本受关注程度、传播率最高的），早已令傅高义在日本也享受了同样的、应该说更火箭式也更持久的关注待遇——就连傅高义不幸于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倏然辞世的消息，最早的公开报道也出自《朝日新闻》等几家东瀛媒体。

## 傅高义：

# 我有这个责任，这是我作为学者的本分

■ 陈飞雪



◀《日本还是第一吗》  
[美] 傅高义著 沙青青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2013年1月20日，北京，傅高义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其新书《邓小平时代》做巡回演讲。

(ICphoto)

2017年初春，《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文版即将付型，周晓虹教授也将近万字的长篇《导读》传给了傅高义（Ezra F. Vogel）先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傅高义为这唯一的中文版本写点儿什么。毕竟，这是他的学术处女作，发表于1960年代初，所作观察也是1958-1960年的日本社会，对于半个世纪后姗姗来迟的译介出版，他怎样理解，如何评判，我们想听他自己对读者说。

很快，傅高义的中文版序来了：这本书是根据1950-1960年间我以日本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所做的一项研究写成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界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

当然，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

他还简述了与第一任妻子苏珊娜到日本做田野调查，访问六户生活在东京郊区的“新中产阶级”（特指在大公司和公共机构就职的白领工薪族，迥异于以小农场主和独立商人为主体的“老中产阶级”）家庭，两年后回国写成报告并发表的过程。随即笔头回转，再次关照中国读者，他知道中国家庭里的妻子，不是日本全职主妇型的，不需要牺牲社会角色，但“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们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何其精准，又何等的切近。

21世纪是不是这部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恰当时机，他没有说，但似乎他和我们一样心有答案。

这本近30万字的专著，不夸张地说，是傅高义日本研究三部曲中最具扎实、奠基性的作品，三部曲从数量上看，无论他自己还是国内外读书界，远没有像《日本第一》那样被拿来一说再说，但它的重要性值得重视。这位求学期间到日本尚毫无了解的社会关系学博士，在28岁的年纪，带着同样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妻子苏珊娜和一岁半的儿子，从哈佛大学飞赴东京再转去郊区的M町，一边学习日语，一边与一些家庭形成亲密的熟知关系，设计了非常专业的调查问卷。在M町的上班族乘火车赶往市中心上班后，苏珊娜访问妻子/母亲，傅高义访谈丈夫/父亲，做了任何一个人类学家都很难不承认的深度“情境化的参与式田野调查”，从主角工薪族的工作、与公司组织的关系，到子女的学校，到家庭关系，到性别分工与相处，最后到社区管理。他不仅发现了刚刚兴起的日本新中产阶级，还将引人入胜的描述成一种文化典范，同时又是经济范畴，诸如如何成为代表“光明新生活”的消费者等等。此一核心发现与生动细致的呈现，使得著作发表之后很快被认可，最终成为深刻影响美国的日本民族志研究的代表作、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尤为可贵的是，其后的二三十年，傅高义和苏珊娜与调查的家庭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追踪、分析工薪族的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变化轨迹。书中闪耀着方法上的贡献与事业激情的光芒、预言新兴力量的前瞻性等等，都是无可替代的。

2013年《日本新中产阶级》在美国出了增订版，补入后续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一章含金量很高的附录：一份长达12页的“田野研究报告”（傅高义毫无保留地披露他们实践出来的民族志的做法，被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赖·克里激赏为“卓越的讨论”，具有某种典范性）。如果了解这些，那么再看傅高义在增补版“后记”里坦承“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看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第一部纪实性著作的再版带来的专业性满足，这部在长达两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著作，倾注了作者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当能理解甚至认同他这份自信和怀念。

### 时代是巧妙的，它自有安排

大多数中国人知晓傅高义，始于2013年他的《邓小平时代》席卷大江南北。百万册级别的发行量，令他从学术界迅速跃入中国公众的视野。而早在1979年，《日本第一》由美国至日本横扫书肆（1979年日本人口总数才1.1587亿，行销70万册，是他所有著述中，在日本受关注程度、传播率最高的），早已令傅高义在日本也享受了同样的、应该说更火箭式也更持久的关注待遇——就连傅高义不幸于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倏然辞世的消息，最早的公开报道也出自《朝日新闻》等几家东瀛媒体。日本对傅高义或者说《日本第一》的高度关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个旁证。2016年3月，经傅高义授权的中文版《日本第一》开机首印，到7月连印四刷，不仅开印前渠道方面对此书会不会引起某种不适的疑虑被打消，旋即还接连收到两家日本媒体的采访要求。其中一边见面先说，“我从上海书城来，看了排行榜”。《日本第一》的热销，唤起他还是少年时看到大小书店此书必在显著位置的记忆，他问，为什么时隔三四十年的日本已经不再到处买买买了，中国还有这么多读者想读这本书？

我猜测发问的他，正是经历了日本从奇迹般崛起的黄金时代走向“失落的30年”的一代。那也是傅高义《日本第一》在美国备受争议、在日本收获巨大声誉、随后质疑与赞誉一直伴随这本书的30余年。那恰好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余年。

时代是巧妙的，它自有安排。有时，提问亦即回答。也是在2016年，傅高义接受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邀请，参加7月在杭州的中华日本学会2016年年会。议程上他的安排，第一天下午就是傅高义先生的特别讲演，题目是“东亚视阈下的日本研究”，众人自然十分期待。孰料傅高义的飞机途中周折，深夜才到杭州，直到第二天，老先生高高的身形才出现在早餐厅，蓝色印花短袖衬衫，见人微笑示意。他是当然的焦点，但没有人一拥而上，取餐时候碰到轻轻点头问个好，让他吃份安静的早饭。随后的报告是精彩的，傅高义从隋唐时期日本到长安学习讲起，那其实也是他正紧张写作的新著的开头——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一年半之后，因为加入《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中文简体字出版权的竞争，我提前看到新著样稿，才有此回味。也只有到他中日两国研究集大成的著

述完成，他在亚洲视阈下的“看日本”三部曲，仿佛才可以最终定位：坚实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是他日本研究乃至所有学术研究尤其是方法上的奠基之作，敏锐的《日本第一》最能代表其学术个性和写作风格，而写于2000年荣休之际的《日本还是第一吗》，无疑是在回应《日本第一》引发的众声质疑与巨大致敬，同时一步步回顾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随着他的辞世，竟成为他唯一的学术回忆录，那些坦率的个人经验之谈，显得弥足珍贵。

这里想说说《日本还是第一吗》的写作背景。1980年代，很多美国人说傅高义说得对，日本果然第一，新加坡、韩国政界都在看《日本第一》。但到了1990年代，很多人说傅高义还是错的呀，日本不行了，还是美国第一。甚至在不同场合都会有挑战的声音，傅高义你当年说日本第一，现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了，你怎么看啊？你认为他们还是第一吗？时

隔20年，傅高义觉得有必要系统地“吵一架”，把他的再思考整理成回应。妙就妙在，这一架他“吵”得坚定又温和，行文轻松，甚至写成了一本充满亲切人事的回忆录。一般的青年学子或者对社会科学有一点兴趣的人都可以看，因为他分分钟都在告诉你日本是怎么过来的，包括他说他在日本请女佣的费用，美国人看来好便宜，她开了价格之后他马上就OK，没有问题。可是当地人觉得这个美国人受骗了吧？又比如，讲到跟日本一些很有名的学者有趣的交往。在战后的日本，他当时是属于比较有钱的，在M町是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两三年以后傅高义离开日本返回美国的时候，就把这个电视机打折卖给了土居健郎，土居健郎非常开心地抱着电视机回去。土居健郎是谁？是日本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的名作《娇宠》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也是社会精英了。

### 他把自己对东亚的观察，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追溯

用译者沙青青的话说：“在我看来他不仅仅是简单的自我辩护或者是回应，更多的是把他自己对日本观察或者说对东亚的观察，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追溯。”而傅高义自认他的这几部著作：“就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照片，《日本新中产阶级》是聚焦1960年日本的一张照片，《日本第一》则是1979年日本的照片。当然也有不同阶段的中国广东和亚洲四小龙的照片。现在，我想更新这些照片。因为当《日本第一》在日本和美国引起轰动后，我愿意在今后几年内回答有关它的问题。”（《日本还是第一吗》傅高义序）

2017年11月5日，傅高义接受华师大夏论坛的邀请，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发表讲演。印象中，较之一年前在杭州，这次傅高义在

台上显得更从容也谈兴更浓，甚至详细描述了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日关系由密切合作交往转向摩擦对立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心理分析。闻之不觉再次印证，他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仍然带有深深的社会学印记，有《日本新中产阶级》埋下的胎记，亦有《日本第一》成就的学术个性。报告后的互动也很热烈，不知是不是年轻面孔的刺激，傅高义的答问里的高频词是“未来”“交流”“学习”——两国之间的感情是复杂的，又是深度关联的，一定要抓住改善中日关系的好时机，尽可能地交流往来和深入了解，相互学习，中日关系的未来，就是东亚的未来。

报告厅能容纳200多人，那天下午是挤满了的，都听到傅高义用中文缓和而坚定地讲：刚刚这些话，我在日本也会同样说，我有这个责任，这是我作为学者的本分。

（作者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日本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还是第一吗》责任编辑）

### 【三味书屋】

## 走进莫言的“卧室”

■ 周立民

《莫言演讲全编》有三卷，分别为《讲故事的人》《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贫富与欲望》，共有80万字之多。相比于篇幅，我认为它的信息量更大、曝光点更多，涉及到莫言的方方面面。从个人经历、创作过程，到读书感受、人生随想；从对世界名著的看法，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的发言，毫不夸张地说，这三本书是莫言的“百科全书”。演讲的现场感、交互性、沟通的需求等特点，使得这些文辞与作家通常的创作有所差异：它们更直接，更坦白。打一个并不高明的比方，平常我们阅读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小说这种虚构性的文字，犹如作家穿戴整齐彬彬有礼地在客厅里接待我们，而演讲，则是他大大方方地把我们领进他的卧室，让我们更大程度地看到私密化的一面。尽管，在卧室里，他并非一丝不挂，他也有衣服，但是，已经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窥私欲”。读《莫言演讲全编》，特别是莫言特有的幽默、叙述的魅力、平白中的智慧、坦直里的狡黠，首先让人感到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听这个讲故事的人讲了很多以往你不曾了解的故事——这是他的人生自叙传、心灵实录和给读者的免费问答集。读过此书，莫言不再像得诺贝尔奖的神仙人物，而成为你熟悉的对门的刘大爷，你可以成功地吹牛：我的朋友莫言，或是说：唉，莫言这家伙！

这家伙谈读书就有很多门道儿。怎么把一本书读透呢，他起初读福克纳，感觉大师光环炫目，读着读着，越发熟悉，更加亲近。再看看福克纳的照片集，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衣

服，旁边是农舍，这和家乡的农民有什么区别？神秘感消失了，感觉不一样了。又了解到福克纳的小心眼儿，福克纳的撒谎，福克纳的恶作剧……“福克纳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彻底地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距离，我感到我们是一对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从远到近，这书越读越薄。莫言还教我们一招，读书也不一定从头读到尾，他当年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读到第16页就扔下了，激动得要写自己的东西。一个小小说家读书，还有帮助作者继续“创作”的冲动，读《第四十一》，他觉得作者写得还不过瘾，如果写到孤岛上的两个人生了孩子，抱着孩子端起枪，面对着情人，这个时候内心的震撼会更剧烈。阅读是写作的背面，作家打开了阅读的窗户，已经在给你展示他的写作状态了。

演讲集中，莫言还给我们分享了众多写作的“秘密”，这是作者自画“供状”，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更为诱人的是，莫言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他说《酒国》，“这部长篇，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但我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我为它感到骄傲。”是作家为作品叫屈，还是这部作品体现了他的写作追求呢？不论怎么样，作者如此隆重，我们也不得不瞪大眼睛。这是1999年莫言说的话，如果谁统计一下，莫言不同时期都推崇自己哪些作品，一定很有意思，至少能够看出作家的创作的变化和不变。当然，他演讲中也屡屡谈到自己的创作观，“饥饿论”让人一声

叹息：“小时候吃不饱的事……也许是解读我的作品的一把钥匙。”（《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第34-35页）他还说，他的作品写的是“一个被吓怕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讲故事的人》第27页）他还讲了很多具体的例子，由此，我们才理解这一代作家作品中何以有那样的历史沉重感和时代感——这些“秘密”倘若不是作者自述，我们又怎么可能了解？

莫言的幽默和机智有强烈的迷惑性，往往让人们误以为他只是沉醉于语言的狂欢与你说说笑笑的人，其实，他的字里行间不乏一本正经。他说：“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他还说过：“我真正的写作动机，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是想用小说的方式，表达我内心深处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想法。这也是获得首届亚洲文化大奖的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晚年所大力倡导的‘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意思。”在另外一次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作家应当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说自己心里想说的一些话，我想即便是讲了不正确的话，也比一个人讲别人的话有价值。要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我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就像巴金老先生说的大家都熟悉的那句——要讲真话。”大作家在精神上都是相通的，正如他对巴金、福克纳、川端康成等人的理解。莫言从强调“老百姓”的身份，到《蛙》中清理作为人的罪感，这不仅是创作境界的提升，其实也真正将创作融到了由前辈们开创的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中了。想一想，巴金先生晚年写《随想录》，不也是在清理心中的罪感吗？



《莫言演讲全编》：  
《讲故事的人》《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贫富与欲望》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他身后站的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莫言这三卷演讲集中遨游，我还有一个感触，成为公众人物的莫言老师太累了，他要面对各种演讲话题，诸如从《爱奇艺与老作家》到《佛光普照》，这是反差多大的题目啊，此时，我不由得心疼起他了。他得奖八年了，八年来这个获奖者的角色让他扮演得好辛苦。幸好，莫言有很强烈的警惕意识，他在演讲中也提到过，作家与普通人和社会生活拉开距离后，“他的精神已经在不知不觉变得平庸懒惰。他已经感受不到锐利的痛楚和强烈的爱憎，他已经丧失了爱与恨的能力”。他也在追问：“我们的写作如何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正是这种警惕和自省让莫言尽管自成一体，也仍保持着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尽管看似闲闲散散，却不失沉重的忧思；尽管一再“莫言”，却忍不住滔滔不绝，正如这些演讲。

（作者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文学评论家）